

岭南古越人名称文化探源

卓晓航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岭南古越人名称文化探源

章晓航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寒 木

封面设计：文 久

责任校对：赵 红

岭南古越人名称文化探源

覃晓航 著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政编码：100081 电话：847281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东方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5.5 印张 120 千字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1-2000 册

ISBN7—81001—996-1/H·65

定价：6.00 元

作 者 的 话

历史上，古越人的名称不计其数，本书研究的仅囿于岭南地区古越人的名称（包括族称、人称、物名、字词名称），而这些名称又多与今操壮侗语族的民族（下文简称“壮侗语民族”）有关。本书注重研究对象的选择，不作面面俱到的解说。选择范围如下：

- 一、历史上引人注目，但长期悬而未决的。
- 二、在史学界有争议，至今未达成一致看法的。
- 三、艰涩难懂，后世无人问津而留下难解之谜的。
- 四、对研究古越人的历史文化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 五、论据充分，考证结果可靠的。

本书独辟蹊径，对每一个问题都不因袭前人的看法，力图在探索过程中扬己语言学之长，并结合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文学等各个学科的知识，综合地对已考证或未考证的岭南古越人名称进行推陈出新、开拓创见的探源。不妥之处，诚望指正。

目 录

导言	(1)
一、古越人名称的研究价值	(1)
二、古越人名称的种类划分	(2)
三、古越人名称的学科范畴	(3)
四、古越人名称的研究方法	(4)
史话	(6)
岭南古越人名称史概说	(6)
族称探源	(12)
骆越与西瓯	(12)
夜郎	(20)
乌浒	(25)
都老与僚	(33)
俚	(37)
獠、侬、狼	(41)
物称探源	(58)
雒田	(58)
干阑与麻栏	(62)
峒	(70)
涯密与密啷	(75)
越地“蛟龙”	(79)
六乌圣母	(88)

人称探源	(98)
译吁宋	(98)
郎火与提陀	(101)
布伯	(108)
字词探源	(112)
婆语	(112)
壁拉与迫勒	(115)
邕、崇、替	(118)
特	(122)
伏	(129)
吊、双、五——音译对象考源	(139)
小结	(149)
岭南古越人名称所反映的文化特色	(149)
附录	(153)
本书音标符号及专用术语说明	(153)
参考书目	(168)

导 言

一、古越人名称的研究价值

古越人名称(下简称“越名”)因形成的年代久远及其音译的局限性,很难为后人所理解,因而无人对它们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即使谈及它们的语源也只能轻描淡写,以致于造成了它们遭冷落的境地,显示不出它们的研究价值。然而,“越名”是在古越人文化孕育下产生的,它们的语源往往蕴藏着古越人典型的文化现象,印记着古越人诸族群的来源。所以,探索“越名”的语源,对研究古越人的文化特征,其族群的来源,分化和发展,以及对揭示古越人早期的语言面貌和历史演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据史载“黎”这一族称是因其人居山岭而得名,寻其语源出自壮侗语,据此可知,古越人的后裔壮侗语民族中有一部分族群的古代居住文化特点是栖身山岭。今天,这些民族“依山傍水而居”是古越人栖身山岭特点的继承和发展。又如,有专家考证出“夜郎”之名源于仡佬语,从而印证了仡佬族和夜郎的渊源关系。这种“越名”之考,持之有据,破释了古越人许多文化之谜,解决了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使后世之人顿开茅塞。

由于“越名”有如此重要的研究价值,不少史学论著都

以“越名”为依据论证古越人的文化特征、民族来源以及社会发展。今天，只要翻开有关研究古越人的文章和论著，以“越名”为据的句段便触目皆是，不管正确与否，可见，“越名”在古越人的研究中已经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古越人名称的种类划分

岭南古越人历史上没有文字，因此只能借助汉字来音译其名，利用汉词来意译其称。这些汉译的“越名”被保留在历代汉文史籍中。从这些史籍中，可以看到多数“越名”属于音译词，我们称之为音译名称。音译名称的外在形式——文字或读音，均不表达任何语义内容。例如，“骆越”之“骆”是个音译名称，从汉语语义的角度看，此“骆”字不表达任何语义内容，因为它只是一个标音符号。音译名称本身虽不能显示语义内容，但可以通过其语源的揭示而探明其所负载的意义。例如，明《赤雅》所载的“栏”之名，如果以其文字形式上看则难解其意，但如果揭示其语源（即壮语中表示“家”意思的词 $ra:n^2$ ），那么，就可以知其所负载的意义是“家”或“屋子”。

与音译名称相对的是意义名称，其特点是：所有意义名称的外在形式——文字或读音，均能表达语义内容。例如，宋《岭外代答》中所载的“土人”就直接从文字上表达了“本地人”的意思。意义名称的形成有两个渠道：其一、意译外民族语中的名称而构成本民族语中的意义名称。例如，汉文史籍《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说的壮族“山人”就是意译自壮语 vun^2 $doŋ^2$ 或 vun^2 $lu:k^8$ （山人）的意义名称。其二、根

据事物特征直接用本民族词来标志客观对象而构成的意义名称。例如，汉文史籍中常见的“铜鼓”一名，就是根据古越人宝物的“铜制似鼓”的特征而以汉语词为之命名的。

音译名称和意义名称是从音义角度来划分的，按此范围分，还可以分出第三种名称，那就是半音译半意译的名称（简称“半音半意名称”）。史载中的“骆田”之名就是一例，此名称中的“骆”字是音译词，“田”是意译词。此外，按称谓对象分，还可以将“越名”分为自称和他称；按年代分，还可以分为今称和古称。例如壮族的“壮”之名是古代“撞”之名的今称，反言之，“撞”之名是现代“壮”之名的古称。最后，古越人诸族群中还有一种同民族而多名称的现象，这种现象叫“同族异称”。

三、古越人名称的学科范畴

名称实际上是语言学词类部分中的名词，因此名称应属语言学学科范畴。但它与语言学中的名词又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因为它还涉及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以及文学等学科。由是观之，名称是一门主属语言学范畴，兼涉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以及文学诸学科的综合性学问，它需要研究者首先具备厚实的语言学基础（尤其是语音学基础）。而对“越名”研究者来说，还要掌握汉语音韵学知识，因为源于壮侗语的“越名”多数是用汉语古音记录下来的音译名称。所以，要准确地考证出其年代的读音，就必须借助汉语音韵学这一工具。除此之外，还要熟悉壮侗语，因为壮侗语是古越人后裔的语言，研究“越名”与此分不开。其次还要具备历史学、民族

学、考古学、地理学以及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因为“越名”负载着民族的文化内容，反映民族的来源和发展，标志着民族居地的地理特征，如果不掌握这些知识，就难于广证博引，准确地揭示“越名”的来源。

四、古越人名称的研究方法

研究“越名”不可随心所欲，应讲究科学方法和步骤。即考证一个名称的来源，首先要视其历史读音和语义（查汉语辞书）来确定它是音译名称还是意义名称。若是音译名称则又看其出自哪个年代，归属汉语史哪一时期的语音（即是上古音、中古音，还是近古音），据此找出其年代的读音。然后，再查明这个名称的族属、流行的区域以及这个区域的语言分布，以确认这个名称的语言归属。例如，“骆越”一名出现于先秦，先秦属汉语上古音，因此，应按“骆越”的上古读音去找其语源。又“骆越”之名主要流行于岭南一带，而这一带又主要是壮侗语的分布区，所以，“骆越”之名的语源很可能归属壮侗语。

考证名称来源的第二步骤是看其在历代史籍中是否附带注义，例如《宋会要辑稿》在记录“黎”之名时就附带注义，即“俗呼山岭为黎，居其间者号为黎人”。其中的“山岭”就是文中所附带的注义，也就是说，“黎”在壮侗语中的意义为“山岭”。如果一个名称在史籍中附带注义，那么，就可以直接将其注义及其读音置于其所隶属的语言中进行同义近音词对照，以找出其音译对象。有时候，往往会遇到好几个与名称的注义相同而语音形式不同的词，这时，就需要进行反复

比较,比较后取读音最近似于音译名称的词为其音译对象。如果一个名称在史籍中没有附带注义,那么,只能根据上下文或名称所属的民族的文化特征进行合理的推测,然后,再在其所隶属的语言中寻觅其音译对象。

如果遇到的名称为意义名称,研究方法就比较简单。有的意义名称的语义一目了然,不必多费笔墨。但也有的意义名称艰涩难懂,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这时候就需要根据其标志的客观对象的特征并结合查阅历代汉语辞书而得其语义。

上述所说的方法不是必然如此,在考证实践中还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一些适合的方法,以对付各种复杂的情况。

史 话

岭南古越人名称史概说

岭南古越人异称繁多，源远流长，早在周代就已流传于世。《逸周书·王会解》载：“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清令以珠玕、海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这些名称令人注目，但由于形成年代较早，不易为后人所理解。春秋战国，出现了“越骆”之名。《吕氏春秋·本味》载：“越骆之菌”。秦汉之际，一批著名的族称相继见于史籍，如“骆越”（有别于上述的“越骆”）、“瓯骆”、“西瓯”等。《史记》载：“以南越桂林监闻汉兵破番禺，渝瓯骆兵四十余万降侯”。《汉书》载：“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赢，南西称王”。“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这些族称与先秦越人的族称有一定的关系：“西瓯”和“瓯骆”中的“瓯”字与《逸周书》中的“瓯邓”之“瓯”字同出一辙；“骆越”与《吕氏春秋》中的“越骆”一脉相承。《舆地志》载：“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有人据此认为“越骆”是“骆越”的误写。而近期又有人云，“越骆”是古越人的语言词序，“骆越”是汉语词序，两者实是同一名称，无所谓误写问题。应该知道，确定一个名称的原始形式要以最早的记载为依据。

“越骆”之名见于史籍的时间最早，当为原始形式，不是误写。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并不算重要，重要的是“越骆”（或“骆越”）的语源之争。在这个问题上，史学界众说纷纭，令人无所适从。汉代的“瓯骆”之名也引起了后人的争议，有人认为“瓯骆”是“西瓯”与“骆越”的并列简称形式，有人认为“瓯骆”只是一个单独的族称形式。诸家各执己见，难于统一。

除了上述诸例外，秦汉时期较有名的族称还有“夜郎”。《史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后人在夜郎的族属上有“濮人说”和“越人说”之争，由此也引发了“夜郎”语源的歧议：有人认为“夜郎”之名出自布依语，有人认为出自壮语，有人认为出自仡佬语，还有人认为出自苗语……各种说法纷纷扬扬，一时难辨真伪。

秦代，西瓯产生了君长，于是，便出现了“译吁宋”的称谓。后世人对这个称谓知道的甚微，只知其为君长之名，侏儻之语，无人能考其语源，解其语义，以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长久的“君名”之谜。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难于捉摸的名称“雒田”，见于《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即：“交趾昔未有郡县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雒田”之名也引起了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雒田”的含义是“鸟田”还是“麓田”。两种看法虽然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把“雒田”之“雒”与“骆越”之“骆”联系起来，认为后者源于前者。

东汉时期，产生了“乌浒”之名。《后汉书·南蛮传》载：“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乌浒”是当时较

有影响的族称，一直延续到两晋时期。这个族称被后人视为怪名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些争论从宏观上看，有“地名说”与“族名说”之争；从微观上看则说法甚多：有的认为“乌浒”是“骆越”、“于菟”的音转；有的认为“乌浒”是“无余”、“于越”的异写；有的认为“乌浒”是“瓯”的慢读；有的认为“乌浒”是壮语 au^1 （要）的音译形式……众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标新立异，光怪陆离。

这个时期，影响较大的族称还有“俚”和“僚”。《后汉书·南蛮传》载：“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募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李贤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还有“合浦蛮俚皆应之”的记载。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的“俚”之名与《逸周书》中的“产里”一名有渊源关系，它的盛行时间一直延续到宋代。有关“俚”名的研究问题分歧并不大，只有“出自黎人自称”和“因山岭而得名”两种看法，而多数人则倾向于后者。“僚”之名见于《三国·蜀·霍峻传》。《博物志》中亦有载：“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到了隋唐，“僚”名的记载越来越多，直至发展成为西南、岭南一带的古代民族的泛称。“僚”名的沿用时间很长，直到宋、明年间仍频繁见于史籍。至于它的来源，各说不一：一说它是由“骆”字音变而成；一说是壮侬语 rau^2 （咱们）的音译形式等等。

隋唐时期，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族称现象，那就是“俚”名和“僚”名常常组合在一起，构成复合式的族称，如《隋书·地理志》载：“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从“僚”名的泛称性质看，史载中的“俚僚”一名实为

“俚人”之义，其中，“俚”字表示专称，即“俚人”，“僚”字表示泛称，以补充说明“俚”的族属。这样，以专称的角度看，则“俚僚”之名可以理解为“俚人”；从泛称的角度看，则“俚僚”可以理解为“僚人”。正如《南史·蓝铁传》称陈文彻为俚帅，而同书中的《欧阳颢传》则谓之为僚人，前者使用了俚人的专称，后者使用了俚人的泛称。

魏代较典型的名称是物名“干阑”，它标记着古越人的原始居舍。《魏书·僚传》：“僚者盖南蛮之别种，……散居山谷……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由于“干阑”是古越人原始居舍的标志，因而探索其语源对研究古越人居舍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鉴于这个原因，后人对“干阑”之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研究“干阑”的观点蜂拥而起，有说“干阑”源于壮语的，有说“干阑”出自侗语的……一时喧嚣于世。

到了唐代，开始流行“峒”的名称。唐代诗人柳宗元在《柳州峒氓》中云：“青箬裹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圩人。”“峒”原是早期古越人聚居区的地理名称，到了宋代则发展成为土司制度的一个政区单位，即《桂海虞衡志》所说的“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峒”之名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过程，有研究之必要。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表示头衔的称谓“都老”和“倒老”。唐《隋书》载：“（僚）有酋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旧事，尉陀于汉，自称‘蛮夷大酋长，老大臣’，故俚人犹呼其所尊为‘倒老’也，言讹，故又称‘都老’云”。“都老”和“倒老”是同名异字，一般人可以从上下文中看出其头衔性质，但在它们的语源问题上并不那么容易识破之，因而需要做深入地研

究。

宋代，岭南古越人当中产生了一系列的奇称异名。其中有族称“撞”和“侬”，有人称“郎火”和“提陀”，有物称“麻栏”，还有语言名称“菱语。”“撞”名和“侬”名是宋代壮族人的族称，后人对它们的语源看法很不一致。“郎火”是僚人头领的称谓，“提陀”相对“郎火”而言，相当于汉语的百姓，以往认为“郎火”之名源出壮语，但细作比较，两者的语音形式差异太大，语义也不完全吻合，故仍有商榷余地。“提陀”之名，历来无人问津，因为在壮语中找不到一个与之同义近音的词，考之实有困难，只能望洋兴叹。“麻栏”与《魏书》中的“干阑”有渊源关系，“麻栏”是“干阑”建筑发展的产物。据史书的记载，“麻栏”之名出自壮语，其中“栏”译自壮语的 $ra:n^2$ （家），这一看法几乎众口一词，但对另一个字“麻”的来源却无人能解释清楚。有人说“麻栏”是壮语词 $ma^1 ra:n^2$ （回家）的音译字。然而，“麻栏”指称住房，是个名词，而壮语词 $ma^1 ra:n^2$ 则意指“回家”，是个动词，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有人认为：“麻栏”是译自壮语中意指“家”并带有复辅音声母的词—— $^x mla:n^2$ 。这个看法不落窠臼，令人耳目一新，一时间引起了语言学界和史学界部分学者的共鸣。可是，这种看法却经不起语言事实的检验，因为在整个壮语方言土语乃至整个壮侗语族诸语言中，均未找到一个意指“家”并带有复辅音声母的词—— $^x mla:n^2$ 。不难看出，上述关于“麻栏”语源的两种看法皆有懈可击。于是，又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菱语”指的是壮语钦州话；这在《岭外代答》的记载中是显而易见的。其问题出在“菱”字上，至今为止，谁也说不准

“葵”的来历，只是有人在论述壮族的来源时，顺带猜测“葵”可能是由“骆”发展而来，“葵语”即“骆越之语”。

明代也出现了不少的奇异名称，如“狼”、“布伯”以及“涯密”和“密唧”等。“狼”是“明代壮族名器一时的族称，它与宋代壮族人的族称“撞”和“依”同出一源。“布伯”是明代古越人的头衔称谓，其来源后世鲜为人知。“涯密”和“密唧”见于明的《炎徼纪闻》，它们标记着古僚人典型的饮食文化特点。遗憾的是，这两个名称未引起后人的重视，致使它们成了冷僻之词。

清代以后，开始有人用汉字成批地记录壮语词语，记音方法基本上是一个汉字记录壮语词语的一个音节。可是，在一些史籍中却出现了以两个汉字记录壮语一个音节的现象，如“壁拉”记录壮语词“鱼”；“迫勒”记录壮语词“菜”。这种记音现象与“汉记壮”的常规记音方法相悖，但又在事理之中，令人欲探究竟。这一时期的奇称还有“六乌圣母”，此名所标志的事物乃是壮族人所崇拜的对象。名称中的“六乌”二字实为壮语音译字，其中蕴藏着“六乌圣母”的原型，揭示这一原型对研究古越人的宗教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越地历史上的“蛟龙”与岭南东西两地的古越人所崇拜的水神原型有密切的关系；汉语辞书中收录的一些特殊字，如“菴”、“崇”等亦与壮族方块字有关，这些都反映了汉文化与越文化的发展和交融，都值得一探。